

# 如何着手研读赵树理

——以《邪不压正》为例

倪文尖

**内容提要** 在被一轮已然完成的经典化所遗忘之后，赵树理研究近来有些复兴之势。本文认为，坦诚地面对研究者自己作为“普通读者”进入赵树理小说文本的困难，是真正展开研究的前提，而研读赵树理的压力和魅力正在于，要拿一个“靠不住”的自己同一个“未完成”的对象去对话。作为一种“如何着手”的初步尝试，本文以赵树理颇具争议的小说《邪不压正》为例，在文本细致的阅读和引用的基础上，透过“主体”、“阶级”及“乡村民主”等视角，阐释赵树理的乡土理解同中国革命的话语和实践“重而不合”的丰富性，并力图为左翼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某些方法论的启示。

—

在2005年北大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这本有意成为全国研究生专业教材的书里，专章讨论“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之外，还有两章“重要作家研究述评”：一章是传统的“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另有一章基本属于1980年代以来越来越热的作家——沈从文、张爱玲、艾青、穆旦、胡适、周作人、胡风<sup>1</sup>。这差不多已然完成的一轮经典化中，赵树理的名字再也看不到了，这是事情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是最近几年来，随着左翼文学传统被重新强调、延安和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渐趋复兴，赵树理作为代表性乃至方向性作家的重要性，又不时见之于论述；亦不难想见，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赵树理”和“现代性”之类关键词的连接，也开始诉诸笔端了。在我看来，无论如何评价、定位赵树理，作家赵树理首先是要拿来读的、是在阅读之中存在的；然而，也恰恰在此基础性问题上，赵树理研究已经不那么“自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从而有必要提出“如何着手研读赵树理”的问题。也许，只有真正对此了然于心了，高度肯定赵树理的价值、从赵树理那里获得启示，等等，才能比较的牢靠。

阅读赵树理小说的主要困难在于，我们一般的阅读图式似乎都不太适用。那几个笼统但有用的“读法”——故事、人物、环境、主题，大体能够说明这一点。先用“读故事”的读法试读《邪不压正》，你会发现它当然是有故事的，但却不像通常以为的赵树理那样，直接按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来展开，也很难说有什么“曲折”或“奇观”的故事，

倒是显得比较缓慢甚至啰嗦。其次，“读人物”，那着实体验了竹内好的看法<sup>2</sup>，赵树理和惯常的西洋小说很不相同，小说“第一主人公”有点难找。那些阅读现代小说所形成的习惯与定见：故事为人物服务；人物性格的丰富和成长，越充分、越曲折才越好，等等，假如被你拿来作为阅读尺度的话，那么，这部作品的格格不入是显然的，让你不适应以至不喜欢也很自然。问题是：这些年的研究对于我们的“不适应”、“不喜欢”也已有了一些结论，像瓦特的《小说的兴起》和黄梅的《推敲“自我”》等都颇具说服力地证明，西洋小说的兴起与个人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相互生产，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对“私我”的重视，也许笛福的小说就不会产生，而文学在“私我”的生产史上所起的作用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因为人们往往在小说的阅读之中才充分体验到“自我”之重要性<sup>3</sup>。更不用说现代主义小说对于“深度自我”的迷恋，我们1980年代的文学比如“向内转”、“性格组合论”，矛盾、痛苦的“心灵的辩证法”之类，都是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观念。这意味着，我们习以为常的阅读趣味，是与现代西式小说的阅读经验密切相关的。沿用那些标准来读《邪不压正》里的人物，你就会发现，人物性格是如此地单一，确实很是“扁平人物”。这就是赵树理的小说人物的一个特点，你往往可用一两个绰号似乎就把他们概括掉了。于是，“人物”也没什么特别的。

还有一个路数的读法，是“读环境”。可是，你很快就会发现《邪不压正》里的小说“环境”、乡村的空间尽管非常重要，却相当缺乏具象式的描写——“风景描写”非常之少，或者说，形象上的具体性太不充分了。既然“故事

情节”、“人物”、“环境”都不行，那剩下的看来就是“读主题”了：这是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总要落实的一个环节。而有关赵树理小说的主题，已经有了许多论述和结论，仿佛不需要怎么具体细致地阅读文本就可以抵达。事实上，无论是多么肯定赵树理的，还是怎样轻视赵树理的，很多人、很多评论，多半是根据已有的、外在于小说文本的东西来推断的，这大概也不妨说是我粗浅阅读赵树理研究史的基本感受。简言之，我们读赵树理，却没有读赵树理的“读法”，这样的状况，实际上已经存在不少年头了；或者我们有一些“读法”，但是，一般的小说读法在阅读赵树理时意义不大，甚至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这当然不是说赵树理的小说读不懂、读不通，而是人们总是觉得自己读出来的东西，对于阐明赵树理的价值和贡献而言，效用相当有限。

对此，当然要反省我们的阅读图式。为什么只有西洋小说般对“深度自我”的迷恋，我们才觉得有意义？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审美感受已经非常西洋化了。所以，和赵树理的小说接不上榫头，也是很自然的事。这样，一种双面性的态度显得尤其必要：一方面，坦承我们“不适应”、自己“不喜欢”，总要比“鸵鸟政策”强；另一方面，不能对“不适应”、“不喜欢”听之任之，需要对我们的“自己”有真切反省。因此，我们要通过赵树理的阅读来测试自己阅读趣味的边界，并由此反省这背后的艺术观和价值观，为什么今天又激发起重新阅读赵树理的热情？那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今天”不满足、不满意，我们希望从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学实践里寻找到一些潜在的可能性。同时，假如左翼文学和中国革命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话，我们今天还怎么可能有不满呢？所以，这“反省”又不是兜底转的“照单全收”，不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以为赵树理那里什么都有、什么都好，而是在阅读赵树理的过程中，借机发现“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因素，而且多半可能是零散化的、碎片式的因素。就此而言，阅读其实变成了非常艰难的事情：要拿一个“靠不住”的自己来面对一个“未完成”的对象，这在我看来，既是阅读赵树理的根本困难，也是阅读赵树理的基本态度。在这个意义上，阅读赵树理可能并不很愉快，因为阅读态度和方式很难是欣赏式的，而往往是研究式的。

## 二

话说回来，我还是相信，中国的特别是当时的农民还是会喜欢赵树理小说的。日本学者千野拓政曾经撰文指出，《狂人日记》之所以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是因为鲁迅写作《狂人日记》时所预设的阅读氛围发生了重大变化，《狂人日记》想象其读者是在一个幽闭空间里独自阅读<sup>1</sup>。由此而论，如果说赵树理和现代西式小说又有巨大转变的话，那他对于那种文学的阅读预设不满是头等重要的。赵树理有意识地把小说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因为他希望自己

的小说能进“文摊”<sup>5</sup>，他对于读者的期待、尤其是阅读方式的期待，确实有重大的调整。按赵树理的说法，他的小说是给农村里识字的人读的；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识字的人读了之后说给那些不识字的人听。因此，赵树理小说和“书面文学”传统是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口传。所以，语言问题一直是赵树理研究的重要方面。周扬曾经指出，赵树理的语言不仅在对话、而且在叙述中也符合农民的习惯；并且，他并不用标签式的方言，而是用标准的现代汉语，通过某种独特的组合方式来表现出“本色”意味<sup>6</sup>。问题是，其一，我们今天的相关论述能比周扬推进多少？其二，赵树理的语言是不是今天文学语言的方向，现在的小说是否需要采用这样的语言？类似的问题都还有待讨论。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邪不压正》似乎还提供了某种反例，文本中还是使用了一些方言的，比如第一章里“顾住顾不住”后马上用一个括号说明“就是说能顾了家不能”<sup>7</sup>。这个括号比较明显地看出叙述者的存在了，同时也表明，赵树理的预设读者未必都是他所说的农民。

这就说到了叙述的层面。我们知道，某种程度上，叙述学的发达是为了现代实验小说提供合法性，当然，从技术角度看，叙述学也为小说的阅读提供了重要手段和方法。不过，赵树理的小说好像就是要打破叙述学所概括的复杂流程：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文本—隐含读者—读者，赵树理的小说简洁明快：他试图把“作者”和“隐含作者”、“隐含读者”和“读者”合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小说没有叙述方面的讲究。例如，现代小说关于“故事”和“情节”的区分，在《邪不压正》中还是比较显著的。赵树理自己对于这篇小说有过一个创作谈，为了回应《人民日报》上的六篇批评文章。其中说到，他写《邪不压正》的意图是“想写出当时当地的土改全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sup>8</sup>。这段话非常重要：“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是赵树理的预设读者，并且，他是要写出土改“全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这个野心还是很大的。那么，《邪不压正》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愿望相差多远？赵树理对此是否自觉？我个人的看法是，他略有所知。赵树理自觉不自觉地以“配合”这样的概念，标明了自己的小说和官方文件之间的关系：他希望他的小说比“文件”更清楚更具体，但他又知道小说无法取代“文件”。也正是对自己作品和文件之间差别的认识，造就了赵树理作为一个叙述者的态度选择：他的主体位置类似于“翻译者”，或者说agent，一方面他很自觉地配合“文件”，另一方面，赵树理又自信自己更容易为农民接受。

赵树理回应《邪不压正》的批评里还有一段重要的话。当时有论者批评说，既然小宝和软英是主要人物，就应该让人物更清晰地“站出来”，而小说中软英的“阶级代表性”却是可疑的。依我个人的观点，“阶级”在赵树理小说里恰恰是一个暧昧的问题，这个下文细说，还是先回到赵树理

自己的答辩。他说之所以套进去个恋爱故事，“是因为想在行文上讨一点巧”，防止公式化，用一个恋爱故事把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土改工作连串起来，“使我预期中的重要读者对象，从读这一恋爱故事中，对那个阶段的土改工作和参加工作的人都给以应有的爱憎”。小宝和软英并非《邪不压正》的主人公，赵树理故意没有给这两个人以“社会代表性”，软英“除与小宝有恋爱关系外，我没有准备叫她代表任何一方面”。

事实上，我阅读的一点突破正是从这个任何方面也不代表的软英那里起步的。请注意下面这段：

软英这时候，已经是二十岁的大闺女，遇事已经有点拿得稳了。她听她舅舅说明小旦的来意之后，就翻来覆去研究。

这是在小说的第三节，这里颇为重要的是强调软英“已经是二十岁的大闺女”。绝大多数土改小说有“公式化”倾向，赵树理对此有很大的警惕。因此，赵树理特别以自然年龄的增长作为人物性格变化的基本理由，这非常像贺桂梅在比较《李家庄的变迁》和《红旗谱》所观察到的，“赵树理将农民的革命思想表现为乡村内部的引爆”，而很少是“一种现代思想的‘外来’输入”<sup>9</sup>。小说结尾处又写道：

软英说：“不用问我舅舅了，这话半句也不差，可惜没有从头说起，让我补一补吧：就是斗争了我爹那天晚上，小旦叔，不，小旦！我再不叫他叔叔了！小旦叫我舅舅到了我家，先叫我舅舅跟我爹说人家主任要叫你软英嫁给人家孩子。说是要从下还可以要求回几亩地，不说的话，就要说我爹受了人家刘家的金镢子。没收了刘家的金镢子主任拿回去了——后来卖到银行谁不知道？那时候跟我爹要起来，我爹给人家什么？我怕我爹吃亏，才给小旦倒了一盅水，跟他说了那么一大堆谎话，大家说这算不算自愿？他小旦天天哄人啦，也上我一回当吧！”

比较小说第一节软英和小宝的一处对话，那可真是天壤之别：

软英说：“我说怎么样！你说怎么样？”小宝没法答应。两个人脸对脸看了一大会，谁也不说什么。忽然软英跟唱歌一样低低唱道：“宝哥呀！还有二十七天呀！”唱着唱着，眼泪骨碌碌就流下来了！小宝一直劝，软英只是哭。就在这时候，金生在外边喊叫“小宝！小宝！”小宝这时才觉得自己脸上也有热热的两道泪，赶紧擦，赶紧擦，可是越擦越流，擦了很大一会，也不知擦干了没有，因为外边叫得紧，也只得往外跑。这个情境很像中国乡村的旧戏中的场景，也是小说中最抒情、最感伤的段落。顺便一说，赵树理这样写，让人很不“过瘾”，但他认为这样才“真实”。而聚焦于软英，谁都不难发现软英的变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自然年龄的增长以外，小说第四节的标题“这真是个说理的地方”道出了这个秘密。

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说理”。而有关于此，小说第一节中并非偶然地有这么一段：

小昌说：“谁给他住长工还讨得了他的便宜？反正账是由人家算啦！金生你记得吧，那年我给他赶骡，骡子吃了三块钱药，不是还硬扣了我三块工钱？说什么理？势力就是理！”

“势力就是理”这最后一句，怎么重读都不过分：你可以衍生出诸如正义、政治的合法性、统治和治理的问题，等等。可惜这里无法展开这些主题。我想说的是，类似的段落，比如下面的：

二姨说：“我早就想问又不好开口。我左思右想，大姐为甚么给软英找下刘忠那么个男人？人家前房的孩子已经十二三了，可该叫咱软英个甚么？难道光攀好家就不论人？听大姐夫这么一说，原来是强逼成的，那还说甚么？”

在小说文本中还真是很不少。贺桂梅认为，“空间”是赵树理小说的主体；而我读赵树理的《邪不压正》有一个直感，那就是人物在不断地说话，仿佛小说叙述者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把人物的话给串起来：通过人物的一系列言谈，小说叙述了下河村时间跨度长达三、四年的土改运动，也是在许多人的许多话里，软英的变化及其场景、语境实实在在地呈现出来了。我觉得，这正是赵树理小说有意无意的深刻主题，并且与丁玲的小说作品如《夜》等有着惊人的对应性：中国革命的介入使得乡土中很多人的精神面貌、尤其是对自己未来的预期，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从怨命、得过且过，转变到去“说理的地方”伸张自己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试图正面处理的问题与小说实际效果之间的差距，恰恰就是“文件”与“文学”之间的差距：“文件”要把土改搞好，侧重的是经济、制度等层面问题的解决，而赵树理看起来是要配合“文件”，意图也是为了写出经验教训，但是反对“公式化”的自觉，实际上使他有意无意地更多偏向于群众精神状态的关注，而这正是“文学”大显身手的着力点。

回到赵树理的创作谈，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他说这个恋爱故事是“当作一条绳子来用”，把“要说明的事情挂在它身上，可又不把它作为主要部分”。看来作家技术性、工具性的考量，在文本实际中所起的效用，往往是作家无法意料更无法掌控的。《邪不压正》的特别之处在于，赵树理并不希望“软英”这个形象非常突出，而削弱了人们对小说人物“群像”的注意力。竹内好对此有很多精当的论述：赵树理小说强调的是一种氛围，一方面可以表现人物的成长，另一方面又不能让人物脱离他生长的环境。事实上，在当代中国主流作品中，正面主人公如何避免个人英雄主义，一直是相当困难的问题，既要让主人公成为“英雄”，又要使之成为“群众”之一员。赵树理这里的方式很彻底：不以核心人物的塑造为着力点；他的操作方式是以故事为核心；而其作品的效果则是，故事之外更有“环境”

的存在；“环境”，在赵树理手里既是“空”的，又是“实”的。所谓“空”，是指赵树理的小说很少直接描写环境。柄谷行人告诉我们，农民是不会感觉到自己家乡有“风景”的，同样，赵树理笔下的“自然村”里也很少有西洋小说中的“肖像描写”。但是，小说中的“话”却使得环境“实”起来：通过这些话语，带出村庄的每一个时刻的“情境”；“话”的背后又总是存在着说话人，这样，“人”的存在也通过言说被揭示出来了。因此我要说，是“话”，是言谈，构成了赵树理小说的主体，是赵树理小说的“主角”。这也就不难理解，赵树理的小说存在着一种舞台感这与他所受的旧戏的影响和传统小说的影响分不开。

### 三

现在，就要读到赵树理的小说中“阶级”等问题了。一方面，如前所述，赵树理显然站在中国革命一边，因为革命不仅进行了让底层百姓获得土地的改革，而且带来了他们精神面貌的变化。同时，阶级话语带来的是对“为非作歹”者的惩治，这一点也是赵树理非常认同的。然而，赵树理的作品又隐约让我们感觉到其乡土社会的理解和逻辑，同“阶级”话语之间又并不完全重合。这里牵涉到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地说，阶级话语是发动革命的核心话语。但是，革命成功了之后，后果却是两方面的：一是“恶人”倒霉，二是“老实人”仍然吃亏。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的立场带着“乡土本分人”的色彩，这一立场恰恰是中国农民的绝大多数。然而，还是有个问题没有解决：革命靠这批老实本分人又还很难搞起来。因此，赵树理的小说并没有避讳“暴力”的问题：

二姨说：“我这三个多月没有来，下河变成个什么样子了？”大家都说“好多了”。安发说：“总不受鬼子的气了！”金生说：“刘锡元也再不得厉害了！”二姨的丈夫接着说：“你舅舅也不住窟窿房子了！”二姨问：“刘锡元是怎么死的？是不是大家把他打死了？”金生说：“打倒没人打他，区上高工作员不叫打，倒是气死了的！”

根据后面的文本，终究也还是“打”了的：

“那老家伙发了急，说‘不凭账本就是不说理！’一个‘不说理’把大家顶火了，不知道谁说了声打，大家一轰就把老家伙拖倒。小昌给他抹了一嘴屎，高工作员上去抱住他不让打，大家才算拉倒。会场又稳下来，小昌指着老家伙的鼻子说：‘刘锡元！这理非叫你说清不可！你逼着大家卖了房、卖了地、饿死了人、卖了孩子……如今跟你算算账，你还说大家不说理。到底是谁不说理？’……没想到开了斗争会以后，第三天他就死了！有人说是气死的，有人说是喝土死的。”安发说：“不论是怎么死的吧，反正是死了，再不得厉害了！”

• 98 •

这里，起码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邪不压正》虽不讳言暴力，但与《暴风骤雨》的正面描写不同，赵树理是有意无意地在众人“话”来“话”去之间涉及的，而党的领导“不叫打”、“不让打”，是小昌这样的人“给他抹了一嘴屎”，况且最关键的，刘锡元怎么死的？众说纷纭，却肯定不是直接被打死。第二，逼着大家卖房卖孩子的刘锡元死了，“再不得厉害了！”让安分守己的老实人重复着、兴奋着，这表明，即使有暴力，也是“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暴力的正当性很有铺垫、无可置疑。第三，即使有暴力，暴力也不是革命的主角，刘锡元恰恰因为一句“不说理”才招致了暴力，那是咎由自取，由此也足以表明，土改整个还是一“说理”的事：首先要有“理”，关键还得“说”。请看这一段：

安发说：“那老家伙真有两下子！要不是元孩跟小昌，我看谁也说不住他。”……金生说：“……刘锡元那老家伙，谁也说过他，有五六个先发言都叫他说得没有话说。后来元孩急了，就说：‘说我的吧？’刘锡元说：‘说你的就说你的，我只凭良心说话！你是我二十年的老伙计，你使钱我让利，你借粮我让价，年年的工钱只有长支没有短欠！翻开账叫大家看，看看是谁沾谁的光？我跟你有什么问题？……’元孩说：‘我也不懂良心，我也认不得账本，我是个雇汉，只会说个老直理：这二十年我没有下过工，我每天做是甚？你每天做是甚？我吃是甚？你吃是甚？我落了些甚？你落些甚？我给你打下粮食叫你吃，叫你吃上算我的账，年年把我算光！这就是我沾你的光！凭你的良心！我给你当这二十年老牛，就该落一笔祖祖辈辈还不起的账？呸！把你的良心收起！照你那样说我还得补你……’他这么一说，才给大家点开路，……”

地主、资本家也是“说理”的，算“小账”你还算不过他们。元孩们的厉害在于，从“结果”算起，不纠缠于细枝末节，算“大账”。麻烦的是，听完了这番话，二姨却还是执著于“小账”地问“那账怎么算？”——没有阶级意识啊！与老实本份的二姨们不同，小昌这些乡土社会中的“能干人”，能说会道，是革命发起阶段的积极参与者，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混进”了革命，相反，“阶级”意识最先能够呼唤的正是他们。赵树理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中国乡土原本有“礼”，尽管只是形式上的伦理，所以刘锡元才敢说“理”；但是，中国革命之所以会在乡土发生，乃是由于传统的乡土伦理已经是表面文章。问题在于，革命发动尤其是成功了之后，也还是小昌这些人获利最多，如果他们私心大、流氓气重、人数多的话，那么就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构成革命后的新的压迫。这虽然是中国历代乡土变革的自然结果和逻辑事实，但是，这显然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庄严承诺，也是赵树理当然不能接受的。一句话，这就是赵树理问题小说的核心问题：他承认环境的变化和农民精神面貌的擢升，然而，他更纠结于新的局面。

另一方面，赵树理在《邪不压正》里并没有把“本分人”理想化。赵树理选择王聚财这个中农作为视角的出发点，而不是典型的“本分人”：聚财也有一个小算盘，总想“看看再说”，就如软英说的，前怕狼后怕虎，不忍心失去苦心得来的田地。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还是认同毛泽东的那句名言，重要的还是教育农民。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即使农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需要加强自我教育。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乡村民主”。可能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一段：

第二天开了群众大会，是小昌的主席。开会以后，先讲了一遍挤封建和填平补齐的话，接着就叫大家提户。村里群众早有经验，知道已经是布置好了的，来大会上提出不过是个样子，因此都等着积极分子提，自己都不说话。

而且据此准备批判所谓的“假民主”。这当然也不无道理，但是，我的读法是还得继续看赵树理接着怎么写，尤其不能忘记第四节的标题：“这真是个说理的地方”。

小宝还没有坐下，小昌就又站起来抢着说：“明明是‘自愿’，怎么能说我是‘强迫’？”元孩指着小昌说：“你怎么一直不守规矩？该你说啦？等软英说了你再说！坐下！”小昌又坐下了。聚财悄悄跟安发说：“这个会倒有点规矩！”安发点了点头。……他（聚财）说：“我活了五十四岁了，才算见小旦说过这么一回老实话！这真是个说理的地方！”他说了这么两句话，一肚子闷气都散了，就舒舒服服坐下去休息，也再没有想到怕他们报复。

在这里，连聚财这样的人“也再没有想到怕他们报复”，赵树理略带揶揄的善意是非常明白的，而且由王聚财的嘴说出了“这真是个说理的地方”！我觉得，聚财的变化和软英等的成长叠加在一起，极大地深化了中国乡土新的主体诞生的主题；你与其忙着去甄别民主的真假，还不如看赵树理从土改的乡村民主中发现了些什么。

固然，这些个“什么”，如我前文所述，既有“可能性”，也有“不可能性”，而且都是零散化的、碎片式的存在。如

果说本文选择《邪不压正》为例作为起始，多半是出于偶然，那么这一番研读之后，自己的收获却还颇为实在：

如何着手研读赵树理？拿“靠不住”的自己真实地对“未完成”的赵树理，一句句、一篇篇，认真地、扎实地读；为什么研读出来的既是些“大问题”又是些“小碎片”？这是赵树理写法的问题？还是我们的读法的问题？答案，在继续不断地认真扎实地研读之中。

- 1 温儒敏等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2 参见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晓洁译，收入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外国学者论赵树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年版。
- 3 参见伊恩·P. 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均译，三联书店 1992 年版；黄梅：《推敲“自我”》，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 4 千野拓政：《文学感受现代的瞬间——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诞生》，收入陈子善等编选《丽娃河畔论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5 参见李普：《赵树理印象记》，《长江文艺》第 1 卷第 1 期，1949 年 6 月。
- 6 参见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1946 年 8 月 26 日《解放日报》。
- 7 《邪不压正》，原载于《人民日报》1948 年 10 月 13、16、19、22 日，同年由冀南和太岳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本文引用版本为《赵树理全集》第 1 卷，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以下皆同，不另注。
- 8 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收入洪子诚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 9 贺桂梅：《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收入唐小兵编《再解读（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董之林